

隱語、進諫與禮

——論《荀子·賦篇》的思想性與時代意義

張 瀛 子*

提 要

本文以《荀子·賦篇》中的賦體隱語為考察對象，嘗試對這篇往往只在文學史中被賦予有限地位的文章進行思想層面的探討，闡明其特性與時代意義。作為一個有著鮮明的儒家自覺的學者，《荀子》的文本具有鮮明的「雅言」特色，即重視經典尤其《詩經》的運用，從中可以看出他傳統主義的語言與文學立場。然而，正因如此，〈賦篇〉用屬於「雅」的賦體寫就源出「俗」的隱語顯得別具一格。筆者認為，這種「以雅化俗」的創作實踐，首先反映了荀子思想的一個重要特質——不是機械性的保守傳統，而是與時俱進，通過吸收新事物來改造和更新傳統。其次，本文從荀子及其學派當時所處的政治與思想環境出發，認

本文 108.08.14 收稿，109.01.10 審查通過。

* 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東亞思想文化學博士班二年級

DOI:10.29419/SICL.202002_(49).0001

為〈賦篇〉是一種具有目的性的文學實踐的產物，是荀子「談說之術」的運用，其目的在於：一方面創造既符合儒家理想、又能適應戰國時代君臣形勢的「新雅言」；另一方面反擊其他學派對儒家經學傳統的質疑。

關鍵詞：荀子、賦、隱語、進諫、禮治思想、先秦儒家

Riddles, Persuasions, and Rituals:

Philosophical Aspect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apter “*Fu*” in *Xunzi*

Zhang Ying-zi*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has been minimal discussion of the chapter “Fu” (Rhapsodies, 賦篇) in *Xunzi*.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riddles (“yin yu” 隱語) in the chapter “Fu”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explaining its features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Xunzi* had a strong sense of self-consciousness as a Confucianist, and his works had been written in a style which shows great respect to the Confucian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tradition. He placed much emphasis on using literary classics, especially the Book of Odes (詩經), which shows his traditionalist viewpoint on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However, *Xunzi* used such traditional style to write the riddles, which were lowly-regarded by cultural elites of that time, therefore making his rhapsodies unique. By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Xunzi*’s riddles with various texts from the pre-Qin dynasty era, such as Strategi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戰國策),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at the chapter “Fu” shows a critical character of *Xunzi*’s traditionalism: he respects traditions but is not adamant in upholding it. Instead, he kept up with the times, absorbed new

* Ph.D. student, Division of Asian Studies,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Tokyo.

knowledge to transform and recreate the tradition.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lso attempts to place Xunzi and his school of thought in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ontext of that time and concludes that the chapter “Fu” is a product based on Xunzi’s persuasion technique theory(談說之術). Such a literary production met the tradition of Confucianism as well as the uprising new literary discourse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unterattacking criticisms others have for the Confucian classics.

Keywords: Xunzi, rhapsodies, riddles, persuasion techniques, philosophy of rules and rituals, pre-Qin Confucianism

隱語、進諫與禮

——論《荀子·賦篇》的思想性與時代意義

張 瀛 子

一、前言

今日我們所見的《荀子》文本源自於西漢成帝時劉向校讎而成的《荀卿新書》。據卷末附有的《荀卿新書》三十二篇中，劉向自述，他所整理的《孫卿書》共有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箸三十二篇」，篇數與今本相同，只是各篇次序不同。劉向所謂「荀卿新書」，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記作「孫卿子三十三篇」。¹ 然而，《漢書·藝文志》在〈詩賦略〉中又列出「荀卿賦之屬」一目，並把「孫卿賦十篇」排在其中的首位。清代章學誠對此認為：「《荀卿賦》十篇居第三種之首，當日必有取義也。」²

在議論中頻頻引《詩》是《荀子》文章的顯著特徵之一，詩賦在有關荀子故事中的重要一幕裡也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據《戰國策·楚四》記載，春

¹ 對此處劉向所述篇數與《漢書·藝文志》的差異，南宋時代的王應麟認為「當云三十二篇」。參見南宋·王應麟著，張三夕、楊毅點校：《漢制考·漢藝文志考證》（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209。又，高正認為：「《漢志》中數字時有訛誤，此當亦屬偶誤耳。」參見高正：《荀子版本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3。

² 清·章學誠著，王重民通解：《校讎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卷 3，頁 120。

申君在聽取門客讒言後辭退了荀子，荀子因此離開楚國，轉而成為趙國的座上賓。此時又有門客以荀子是「天下賢人」勸說春申君，春申君於是派遣使者請回荀子，荀子對此「爲書謝」，並作了一首帶有諷刺意味的「賦」。³ 今本《荀子·賦篇》的最後一首與《戰國策》所載之賦僅數字之差，劉向在〈荀卿新書三十二篇〉中也引用了《戰國策》中的這一則故事，但《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卻沒有相關記載，其可信性在後世荀子研究中存在爭議。然而，即使如此，這一故事的流傳本身可以表明，從戰國末期到西漢，中國的思想世界裡有關荀子的印象中包含「賦作家」的一面。換言之，荀子的賦對於理解荀子其人及其思考而言，必有意義。

自宋代儒學尊孟以後，世間對荀子的一般印象就以性惡論為中心，荀子為此甚至一度被排除在儒家正統之外。⁴ 與此相對的是，在文學的世界，荀子一直保持著賦文體之開山的重要地位。漢代班固在〈藝文志〉中稱：「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⁵ 賦為漢朝一代文學之代表，然而荀子所作之賦，與我們一般印象中的賦——也就是漢賦，有著明顯的差異。比如，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把荀子與宋玉、枚乘、司馬相如、賈誼、王褒、班固、張衡、楊雄、王延壽並列，認為「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卻用「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來指稱荀子賦。⁶ 所謂「隱

³ 西漢·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校：《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17，頁892-894。

⁴ 荀子在北宋元豐七年（西曆1084年）入祀孔廟，後在明代嘉靖九年（西曆1530年）的孔廟改革中被除去從祀資格。關於這兩次孔廟從祀改革的意義，參考〔日〕小島毅：《宋學の形成と展開》（東京：創文社，1999年），頁165。又，黃進興有〈荀子：孔廟從祀的缺席者？〉，收入《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365-383，專題討論了荀子在孔廟及儒家內部的地位變遷。

⁵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30，頁1756。

⁶ 南朝梁·劉勰著，黃叔琳注，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卷2，頁96。

語」，即〈藝文志〉中記載的「隱書」。唐代顏師古在〈藝文志〉註釋中引言：「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論。』」⁷換言之，「隱語」、「隱書」相當於現代漢語中的「謎語」。劉勰在《文心雕龍·諧隱》中稱：「隱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又言「荀卿〈蠶賦〉，已兆其體」⁸，可見「隱」與「隱」相通，荀子所作之賦，其實是以賦體寫就的謎語。⁹梁啟雄認為，「荀子賦篇的體例是：先斂藏起謎底，用隱語說出謎面，隨後指出謎底；與『遯詞以隱意，譎譬以指事』的『隱』或略同。賦字含義有二：（一）斂藏。（二）敷布。荀子賦篇似兼而用之。」¹⁰於是，以賦體作隱，使荀子與其他九位「辭賦之英傑」有了顯著的差別。

清代程廷祚認為，「荀卿〈禮〉、〈智〉二篇，純用隱語，雖始構賦名，君子略之」¹¹，反映了清代以前的傳統學人對荀子賦的研究，基本止於指出其文學價值與創始之功。到了近現代，關於荀子賦的探討仍然主要被包含在有關賦文體起源與發展的研究論述中，¹²直到近年，朱曉海、伍振勳開始挖掘〈賦篇〉的思想內涵與歷史意義，特別是伍振勳深入探討〈賦篇〉中的「雲」賦，將其與

⁷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30，頁 1753。

⁸ 南朝梁·劉勰著，黃叔琳注，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卷 3，頁 194-195。

⁹ 在賦與隱語的關係這個問題上，朱光潛認為隱語是「一種雛形的描寫詩」，而「中國大規模的描寫詩是賦，賦就是隱語的化身」。參見朱光潛：《詩論》（北京：三聯書店，1984 年），頁 35。馬世年則認為「賦」在荀子的時代不是後世般嚴格的文體名稱，而只是一種表達形式，故可以將用以諷諫的「隱」稱為「賦」，參見馬世年：〈《荀子·賦篇》體制新探——兼及其賦學史意義〉，《文學遺產》2009 年第 4 期，頁 23-31。

¹⁰ 梁啟雄：《荀子簡釋》（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年），頁 355。

¹¹ 清·程廷祚：〈騷賦論〉，《青溪集》（《金陵叢書》乙集之十，蔣氏慎修書屋校印，1915 年），卷 3，頁 10。〈騷賦論〉：「或曰：『騷作於屈原矣，賦何始乎？』曰：『宋玉。荀卿〈禮〉、〈智〉二篇，純用隱語，雖始構賦名，君子略之。』」

¹² 關於賦文體的起源與變遷的研究無比豐富，在此僅列出兩篇以荀子為主題的代表性論文，馮良方：〈荀卿賦綜論〉，《雲南教育學院學報》第 8 卷第 4 期（1992 年 8 月），頁 83-93；馬世年：〈《荀子·賦篇》體制新探——兼及其賦學史意義〉，頁 23-31。

荀子的王道政治、聖人「心術」相聯繫，同時與孟子進行比較，在先秦儒家關於「水」概念的詮釋史中為荀子賦找到了位置。¹³ 兩位先生緊密貼合〈賦篇〉的文本的內容，從荀子思想、儒家思想的內部視角進行了細緻的概念探討，而本文的問題意識側重於文本的「對外」形式，認為文體本身包含某種思想主張，而荀子作為一個有著強烈自我意識的儒者，其文本總體展現出鮮明的傳統主義性格，¹⁴ 即「《詩》、《書》雅言」的特點。然而，也正是因為如此，以賦體作隱的〈賦篇〉才顯得別具一格，因為隱語是源出於俳諧巫祝的一種「俗文」。文體是思想的反映，文體的變動也就是思想變動的折射，本文因此認為，雅俗合一的〈賦篇〉反映了荀子思想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特質——不是機械性的保守傳統，而是與時俱進，通過吸收新事物來改造和更新傳統。其次，本文從荀子及其學派當時所處的政治與思想環境出發，認為〈賦篇〉是一種具有目的性的文學實踐的產物，是荀子「談說之術」的運用，其目的在於，一方面創造既符合儒家理想、又能適應戰國時代君臣形勢的「新雅言」；另一方面反擊其他學派對儒家經學傳統的質疑。詩賦與隱語在先秦時期流行，同為言語交流中的修辭技巧，但到了戰國時代，隱語頻頻出現在身分卑微者進諫強權君主的故事文本中，其背後是「禮崩樂壞」、「處士橫議」對君臣間政治語言型態產生的深刻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以法家為首的諸子對進諫乃至語言本身展開思索與爭鳴，

¹³ 朱曉海：《漢賦史略新證》（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57-62、64。伍振勳：〈「逝者」的意象：孟子、荀子思想中的流水、雲雨隱喻〉，《成大中文學報》第31期（2010年12月），頁1-26。

¹⁴ 柯馬丁（Martin Kern）在他考察《荀子》文本性質的論文中指出，詩歌風格在《荀子》裡「常見、有時甚至是無處不在」，並認為「這種語言風格同時也是思想的風格。這是《荀子》裡相當部分的議論得以展開的媒介」。再者，「對《荀子》及其他早期中國文本而言，用詩歌說話就是用傳統權威的聲音說話，這種聲音內涵了強烈的真理訴求」。〔德〕柯馬丁（Martin Kern）著，楊治宜譯：〈《荀子》的詩性風格〉，《邯鄲學院學報》第22卷第4期（2012年12月），頁107-119。

而荀子〈賦篇〉以實際創作回應了當時針對《詩》、《書》經典的質疑，同時宣揚了以禮為核心的政治理想，由此或可得出〈賦篇〉在先秦思想史中的意義。

二、先秦時期的隱語及荀子的「雅言化」改造

「隱語」——也就是謎語，為什麼會被收錄在《荀子》中？通過考察從先秦到漢代，是什麼樣的群體出於什麼目的創作了隱語，我們可以解釋這個問題。

謎語在人類文化中的歷史非常古老，其源頭是民間的一種語言文字遊戲，在古代西方世界經常與神話、預言等宗教因素相關聯。¹⁵《國語·晉語五》記載「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三國時代的韋昭注曰：「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詆之，乃與為隱耳』是也。」¹⁶ 通過《國語》及韋昭的傳述，我們可以了解到中國古代謎語的作者至少包含兩種人物：一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客」即門客；二是以東方朔為典型的「滑稽」。門客是自負才能而投奔權貴門下以求任用者，在先秦尤其戰國時代非常活躍，聘用荀子為蘭陵令的春申君即以養客聞名。據《史記》中齊國孟嘗君的故事可知，戰國門客的才藝非常多樣化，如「雞鳴狗盜」般「不登大雅之堂」的能力也可被起用，而上述《國語》中「秦客」的才藝大概就是作謎。謎語在先秦故事中並不罕見，類似「秦客」的作謎者在當時應該達到了一定的數量乃至形成現象，漢代劉向《說苑·正諫》中收錄有如下記載：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不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

¹⁵ 比如，在古代希臘，神諭往往以謎語的形式出現，而圍繞著謎語展開的著名神話有司芬克斯和伊底帕斯的故事。參見朱光潛：《詩論》，頁 30-40。

¹⁶ 春秋·左丘明撰，吳·韋昭注：《國語》（臺北：中華書局，1966 年），卷 11，頁 4。

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誅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楮畫，不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秣；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¹⁷

由於晉平公與咎犯（狐偃）時代不同，上文的歷史可信性受到考證家的質疑。¹⁸不過，《後漢書·宦者列傳》中，呂強的上疏內有：「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¹⁹與上文謎底中後四項重合，進諫對象也同為晉平公，區別只在進諫者不是咎犯而是師曠。或可認為，與上文相類的故事在漢代具有一定的普及性，是當時流傳下來的有關先秦時代的集體記憶，無論其中的具體人物是否真實，我們都可以從中提取以下兩點訊息：（1）揭開「隱」的謎底的動詞寫作「占」或「歸」。（2）「隱」在先秦時代相當興盛，朝中有專門做謎語的「隱士十二人」也不足怪。覽諸文獻，與隱語相關的故事多以楚國與齊國為背景。²⁰

¹⁷ 西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9，頁209-210。

¹⁸ 南宋·王應麟撰，清·翁元圻輯注，孫海通點校：《困學紀聞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5冊，卷10，頁1385-1386。

¹⁹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78，頁2530。

²⁰ 齊威王之事見《史記·滑稽列傳·淳于髡傳》，楚莊王事見《史記·楚世家》，分別參見西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126，頁3197-3198；卷40，頁1700。又見西漢·劉向：《列女傳·變通·楚處莊姪》，收入《穆天子傳·列女傳·高士傳》（臺北：中華書局，1972年），卷6，頁12-13。

荀子出身的趙國係從晉國而來，齊、楚兩地又是荀子人生中的兩大活躍區域，²¹ 再加上趙、齊、楚均為戰國後期大量門客的聚集地，²² 門客、隱語和荀子之間的相互關聯性於是明瞭。

韋昭提示的第二類隱語作者「滑稽」說明，隱語在戰國秦漢年間成為了藉以娛樂人主和邀寵的一門技藝。韋昭引用的《漢書》東方朔傳記中，東方朔憑藉臨機應變的隱語作答贏得了常侍郎的地位與漢武帝的青睞。²³《史記·滑稽列傳》記載「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可見人君通過隱語尋樂之事古已有傳，²⁴ 漢武帝只是承其流風。隱語原本就以遊戲和娛樂為目的，能獲得人君喜愛並不足怪，這也可以解釋門客中出現作隱語者的原因。然而，晉平公的故事中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即一個無官無爵，起初只能憑藉「樂」方能進

²¹ 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荀子遊學於齊國並且「三為祭酒」，後來應春申君招聘在楚地為蘭陵令，春申君死後留在蘭陵教授著書，直到逝世。西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 74，頁 2348。

²² 西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 85，頁 2510。〈呂不韋列傳〉：「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

²³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65，頁 2844-2845。〈東方朔傳〉：「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譽。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聲聲，尻益高。』舍人悲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聲聲者，鳥哺穀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狌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狌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

²⁴ 需要注意的是，《史記·滑稽列傳》此處所載齊威王「一鳴驚人」的故事有不同人物的複數版本，如《韓非子·喻老》則以同樣故事的主角為楚莊王，但此類記載都說明戰國時代隱語為人君娛樂之一。參見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卷 7，頁 456-457。

見國君者，通過隱語發表了一套嚴肅的政見，最終一躍成為國家政治的直接參與者。此中的非同尋常處，不僅在於主人公社會地位的戲劇性轉變，還在於本為戲謔的隱語，在此充當了高層嚴肅的論政語言。

《漢書·東方朔傳》贊語稱東方朔「詼達多端」、「應諧似優」，說明包括隱語在內的「詼諧」在當時被視為俳優之能事。這種觀點在中國歷史上具有一貫性，如南朝劉勰認為「諧隱」之於文辭就如同「小說」之於九流，其價值僅限於具備教化作用時，否則就是「空戲滑稽，德音大壞」。²⁵ 明代郭子章在《諧語》序文中亦根據「名教」把「諧」分為正反兩類：「顧諧有二：有無益於理亂，無關於名教，而御人口給者，班生所謂口諧倡辯是也。有批龍鱗於談笑，息蝸爭于頃刻，而悟主解紛者，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是也。」²⁶ 而與「諧隱」相對的精英階層即士大夫的語言，本文據《論語·述而》中「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稱之為「雅言」。《論語注疏》正義曰：「雅，正也。子所正言者，《詩》、《書》、《禮》也。此三者，先王典法，臨文教學，讀之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²⁷ 宋儒朱熹曰：「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²⁸ 通過以《詩》、《書》、《禮》為核心的「雅言」，中國古代士大夫學習先王典法，「雅言」因此亦為正統的政治語言。既然如此，源出「俗文」的隱語，究竟如何得以越過伎樂俳優的分野，擔負起「雅言」為家國天下申述的重任？本文認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動盪帶來的社會流動是一個現實的原因。觀諸文獻會發現，戰

²⁵ 南朝梁·劉勰著，黃叔琳注，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卷3，頁195。

²⁶ 明·郭子章：〈諧語序〉，《六語·諧語》，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子部·雜家類》（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65冊，頁194。

²⁷ 魏·何晏集解，北宋·邢昺疏，清·阮元校勘：《論語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第8冊，卷7，頁62。

²⁸ 南宋·朱熹注：《論語集注·述而》，收入《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4，頁97。

國門客的主要職責是提供建議、出謀劃策，也就是動用自己的識見服務人主，卻也不乏孟嘗君所養「雞鳴狗盜」般利用特殊技能者。這類人物往往受到鄙夷，因此不太可能出身世襲貴族，但立下功勞就讓周遭心服，²⁹ 反映了亂世中流行的實力主義，重視結果而不問方法貴賤。於是，如果我們從這一視角重讀前引晉平公與咎犯的故事就會發覺，這是一個藉娛樂接近權力，快速實現社會地位提升的成功故事。由此可見，「禮崩樂壞」促進了人員的上下流動，是隱語這樣的「俗文」進入政治話語的原因之一，³⁰ 而隱語的世俗性與非傳統性，勢必衝擊上層社會舊有的文化及價值觀。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現存先秦文獻幾乎全部經過了劉向父子的整理，而兩人的價值觀受漢代儒學影響，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傳世故事中的隱語多數符合儒家的價值觀，即起到了匡正君主的效果。讓我們再以晉平公與咎犯的故事為例，這則故事被收錄在《說苑》的〈正諫〉中，據此推測劉向的用意，應該是把進諫視作這個故事的主題與關鍵。然而，如前文所述，這個故事若從主人公

²⁹ 西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75，頁2353-2355。〈孟嘗君列傳〉：「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

³⁰ 周鳳五認為，賦的起源與隱有關，從文體和功能看，兩者都屬於宮廷文學。參見周鳳五：〈由文心辨騷、詮賦、諧謔論賦的起源〉，中國古典文學會主編：《文心雕龍綜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店，1988年），頁391-406。對此，伏俊璉著眼於隱的作者身分，認為隱與古代巫史關係密切，後來成為戰國策士的談助，俳優侏儒勸諫國君的工具。參見伏俊璉：〈《漢書·藝文志》「成相雜辭」「隱書」說〉，《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頁52-56。戰化軍提出的意見與周鳳五略有不同，認為隱語產生於民間，後漸入宮廷，逐步士人化。參見戰化軍：〈先秦隱語研究〉，《淄博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7卷第1期（2001年3月），頁60-65。筆者認為，隱語究竟屬於「宮廷」還是「民間」，很難作清晰的界定。本文之所以將隱語當作「俗文」，主要是相對於「雅言」而言，但由於隱語的基本性質是娛樂，將其歸為「俗」應無大礙，只是這種「俗」更多是在「普羅大眾」的意味上言之，而非根據經濟、身分等階層屬性來界定。

地位變化的角度去理解，就會產生迥異的印象。筆者認為，這個故事的關鍵實際上不是進諫，更不是進諫的內容是否符合儒家價值，因為同樣的內容如果以別的方式呈現給晉平公，結果就是「敢有諫者死」，而咎犯之所以能扭轉局勢，是因為他的進言採取了隱語這一打破常規的路徑，換言之，在於方法，而不在於內容。南朝的劉勰之所以會產生「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穉之戲謔，搏髀而忤笑哉」³¹之感，是因為他所目睹的資料已經過了劉向的篩選。咎犯將自己的個人顯達與匡正君權相結合，於公於私都可謂圓滿，但正如積極納諫的虛心君主終究是少數一樣，在亂世中志在躋身廟堂又能做到私利與公義兼顧者，在現實中恐怕寥寥無幾。

在充滿變革的時代中，如果有人要用「俗」的文體表達「雅」的內涵，又要遏止前者對後者的反噬，無疑會非常困難。《漢書》記載東方朔「十六學《詩》、《書》」，且有志於經世，他的上書雖被班固評爲「專商鞅、韓非之語」，但言辭之間時不時引經據典，《史記·滑稽列傳》則稱他臨終之際用《詩經》勸諫漢武帝，儼然一個飽讀詩書的「雅言」之士。東方朔身上存在「士」與「俳」兩種性格，然而終被冠以「滑稽」之名，或許象徵了夾在「雅」、「俗」之間者的尷尬處境。然而，對於一個致力於傳承古代經典的儒者而言，如何在兩端之間尋找平衡，當是一個無法迴避，同時也義不容辭的挑戰。³²

《荀子·賦篇》共收錄七首作品，前五首是謎底分別爲「禮」、「知」、「雲」、「蠶」、「箴」的隱語，第六首題爲「佹詩」，第七首即《戰國策》所載答春申君

³¹ 南朝梁·劉勰著，黃叔琳注，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卷3，頁195。

³² 簡宗梧將賦與隱語之間的關係稱作「雅俗文學之間的交流互動」，並指出了荀子在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把隱語的對話形式引入到賦文中。參見簡宗梧：〈賦與隱語關係之考察〉，《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8期（2004年5月），頁33-54。簡氏的探討對象主要是賦與隱語這兩種文體的歷史變遷，而本文以下論述著眼於文體變化背後的思想性，認為這種「雅俗互動」是荀子思想特徵的反映。

賦。五首隱語都採用了問答的形式，雙方角色依次為「臣／王」、「臣／（未載）」、「弟子／君子」、「臣／帝」、「臣／王」，可見荀子設想的猜謎主要發生在君臣之間，與先秦隱語故事發生的一般場景相吻合；〈禮賦〉、〈雲賦〉在揭開謎底時使用了「歸」這一動詞，與晉平公故事中的隱語語法相一致。由此可見，荀子應是遵循了當時通行的隱語寫作手法，而其獨特之處，首先體現在文采上。以《戰國策·齊策》中的一例為比較對象：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

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

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

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海）大魚乎？

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

君長有齊陰，奚以薛為？夫（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

君曰：「善。」乃輟城薛。³³

這裡出現的謎面是「海大魚」三字，謎底是「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齊人藉此比喻靖郭君與齊地的利害關係，勸說靖郭君不要在薛地築城。與晉平公的故事一樣，隱語在這裡為一介「齊人」創造了進入朝堂的契機，達成了其政治目的。不過，雖然這首隱語有著字數限制這一前提性的制約，³⁴ 總體而言幾乎沒有文學加工。與之相比，借元代祝堯之語言之，「（荀）卿賦五篇一律全是隱語，描形寫影，名狀形容，盡其工巧，

³³ 西漢·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校：《戰國策箋證》，卷8，頁491-492。

³⁴ 在一定的限制條件下作文，其本身帶有和隱語相通的遊戲性質，《世說新語·文學》中曹植被命作「七步詩」的故事蓋其流風。參見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正文書局，2000年），卷上，頁228-229。

自是賦家一體，要不可廢」。³⁵ 以〈禮賦〉為例：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而易知而致有理者歟？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歟？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歟？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禮。³⁶

這首以「禮」為謎底的隱語使用了對偶、排比和押韻，謎面中包含的意象比齊人的「魚」和「海」更多樣，涉及廣泛的人類活動（絲帛、喪葬、城郭、軍隊）與自然現象（日月、生死），堪稱漢代大賦之先聲。另外，荀子連結謎面和謎底的方法與齊人有著性質上的不同。齊人在「大魚／靖郭君」與「海／齊」之間設定了關係的類同性，猜謎者需要的是聯想和類比的能力。與之相對，「禮」賦的謎面及「王曰」部分的解答都是對「禮」的闡釋，且這裡的「禮」並非具體的禮儀條文，而是思辨層面上的「禮」，猜謎者需要對「禮」的抽象意義有一定理解才能做出反應。這樣一種連繫不僅讓謎底與謎面更緊密地對應，還使整個隱語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獨立」作品。以《史記·滑稽列傳》載淳于髡的隱語為比較對象：

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

³⁵ 元·祝堯：《古賦辨體》，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1986年），第1366冊，卷2，頁744。

³⁶ 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卷18，頁1009。

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³⁷

「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是一段短小的散文，齊威王的回答則有一點對偶的味道，但這首隱語總體比較直白，用「鳥」和「不鳴」比喻「王」和「不作為」，指向發言者當下想要討論的具體事項，即齊威王的執政態度。但是，這首隱語如果缺少了淳于髡與齊威王這兩個角色、脫離了齊國政治這一特定語境就無法成立，任何人可以從任何角度為「鳥不鳴」作解，謎底不必為「一鳴驚人」。淳于髡以及齊人的隱語無法脫離各自的前後文，因此無法單獨流傳。與之相比，《荀子》的〈禮賦〉雖然也採用了君臣問答的形式，「臣」與「君」具體是誰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問答形式闡明「禮」之概念，而概念可以脫離特定語境。只要具備閱讀和思維的能力，任何人都可以從這篇〈禮賦〉的謎面推出謎底，或是通過謎底理解謎面。《荀子》的隱語，因此能夠在其潛在讀者間單獨流傳。

總而言之，與先秦故事中門客們的隱語相比，《荀子》的隱語重視文辭之美，從作品創作的角度看也更加合理和成熟，可視作隱語這一文體的進一步發展。實際上，《荀子》中的「俗文」可能不止於隱語。清代盧文弨以為《荀子·成相篇》是「後世彈唱之祖」，王天海「疑『成相』乃古代說唱文學體裁之一，大體如詩而俗，為念誦講唱之詞也」，³⁸ 而褚斌傑認為「荀況是當時的一位重視通俗文學功能，並且善於利用民間文體的作家」。³⁹ 然而在此需要提醒的是，《荀子》篇章中引用最多、佔據最核心地位的終究是象徵傳統「雅言」的「詩」，其中絕

³⁷ 西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126，頁3197。

³⁸ 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卷18，頁977-978。

³⁹ 褚斌傑：《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70。

大多數見於今日《詩經》。既然如此，荀子為什麼要採納隱語這一「俗文」，又為什麼將其推向進一步的發展？

「俗文」與「雅言」並存於《荀子》，或可以從史傳中荀子的個人經歷，抑或《荀子》作者的複數性加以部分解釋。據《史記》記載，荀子「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應深受齊國學術影響。齊國在歷史上發生過君臣逆轉的事件，風氣開放不泥古，門客眾多，齊宣王時喜「文學遊說之士」，聚集了騶衍、淳于髡、田駢等「稷下學士」，其中淳于髡如前文所述是一個與隱語有關的人物，騶衍與田駢則有擅長談辯的名聲。荀子在他們之後「三為祭酒」，作風上應有某種承接關係。《戰國策·齊策》載荀子回絕春申君的文章，廣引《春秋》及近代時事以諷刺高位者不得善終，最後以賦作結，確實給人「文學」與「遊說」的雙重印象。抑或者說，《荀子》文本的作者同時包含這兩類群體，但無論如何，《荀子》的作者身處戰國時代活躍的新興文化氛圍中，當屬無疑。本文認為，《荀子》文章中的雅俗雙重性，既是《荀子》文本形成的外部環境的如實反映，也是荀子自身的一個基本思想特點的體現。荀子對隱語的改造，首先在於文辭的賦體化，也就是詩歌化，而這，可以視作《論語·季氏》中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⁴⁰的傳統之延續。漢代班固在《藝文志》中稱：「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⁴¹無論其有關古代的陳述是否真實，應該反應了儒家「雅言」傳統的古老理想，這種理想在戰國時代的「禮崩樂壞」中面臨了挑戰。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荀子對隱語的詩化改造，可以視作「俗文」的「雅言化」，同時又是「雅言」內容的擴大與更新。「雅言」從此可以包括舊有的《詩》、《書》、《禮》以外的內容，而在這樣一個經過了擴充的「新傳統」中，「俗文」擁有了自己的合法位置。這

⁴⁰ 魏·何晏集解，北宋·邢昺疏，清·阮元校勘：《論語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第8冊，卷16，頁150。

⁴¹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30，頁1755-1756。

種雅俗、新舊雙向的改造，反映了荀子在繼承的同時更新傳統的態度，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態度包含的思維方式貫穿於荀子思想整體。比如，儒家學派從尊古思想出發，往往持有崇尚「先王」的政治立場，荀子卻提出了既尊重「先王」又效法「後王」的獨特觀點，對此展開豐富的論述。⁴² 由此可見，《荀子·賦篇》的意義，絕不止於單純的早期文學史層面，其內涵是整個荀子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

接下來，本文認為，通過荀子在〈非相篇〉中提出的「談說之術」的概念，我們可以進一步闡明荀子在〈賦篇〉中改造隱語的意義。荀子的「談說之術」，是對戰國時代引起諸子百家關注的一個重要政治命題——如何在權力面前說話——的回應，具體而言就是如何更有效的進諫，也就是說服君王。詩賦與隱語在先秦時期流行，同為言語交流中使用的修辭技巧，但到了戰國時代，隱語頻頻出現在身分卑微者進諫強權君主的故事文本中，其背後是「禮崩樂壞」、「處士橫議」對君臣間政治語言型態產生的深刻影響。從這樣一種外部環境的視角來看，荀子以賦體寫就隱語的創作行為，就不僅僅是繼承和更新傳統的「俗文雅化」，還伴隨著明確的現實目的性，是「談說之術」的具體運用，目的是反擊針對儒家經典的批評、說服君主並呈現自己的思想主張——以禮為核心的政治理想。

⁴² 《荀子》中關於「後王」的論述頗多，涉及制度、語言等多方面，本文對此不詳細論述，只引用〈王制〉中的一段文字，作為荀子尊後王的同時強調復古觀點的代表。「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聲則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參見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卷5，頁365。

三、從荀子「談說之術」論作為一種創作實踐的〈賦篇〉

進諫，是發生在君臣之間的勸說行為，是通過語言讓他人遵從自己的意志的說服行為之一。〈非相篇〉中「談說之術」的概念，是荀子有關語言勸說的觀點的總體概述：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諭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⁴³

如何通過語言手段讓他人遵從自己意志，涉及到自我與他者的關係、語言的局限性等哲學命題，而戰國時代諸子百家對此的探討，可以通過他們對進諫的看法來分別考察。據 David Schaberg 的觀察，戰國時代到西漢年間，中國思想界內興起了有關直諫的價值的哲學探討，並逐漸傾向於肯定間接進諫乃至沈默的立場。⁴⁴ Schaberg 的觀察能夠找到相應的文本支持，比如《莊子·至樂》中就有對烈士冒死直諫的意義表露懷疑的以下內容：

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

⁴³ 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卷3，頁192。

⁴⁴ David Schaberg, "Playing at Critique: Indirect Remonstra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Shi Identity" in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ed. Martin Ker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p.203.

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⁴⁵

唐代成玄英注疏稱：「夫爲臣之法，君若無道，宜以忠誠之心匡諫；君若不聽，即須蹲循休止，若逆鱗強諍，必遭刑戮也。」「吳王夫差，荒淫無道，子胥忠諫，以遭殘戮。若不諫諍，忠名不成。故諫與不諫，善與不善，誠未可定矣。」⁴⁶ 莊子與成玄英相隔近千年，但臣子因言獲罪的現象貫穿整個中國史，成玄英的論述不妨為《莊子》良注。不過，《莊子》更關注語言文字在表意和交流上的根本性局限問題，超越了社會政治的範疇，上升到形而上學，得出了擺脫語言本身的主張。⁴⁷ 留在人世層面探討進諫問題者，除《荀子》以外還有《韓非子》，不僅有〈難言〉和〈說難〉兩篇專論人臣在君主面前陳詞之難的篇目，還詳細列舉和評述了多種不同的進諫類型，表現出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關注。

《韓非子》考察了進諫君主之所以困難的原因，在〈難言〉中有如下的觀點：

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

⁴⁵ 清·郭慶藩撰，王孝順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卷6，頁608-609。

⁴⁶ 同前註，卷6，頁609。

⁴⁷ 表達莊子這一立場的有《莊子·雜篇·外物》中著名的「荃蹄」之喻：「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同前註，卷9，頁936。

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⁴⁸

通過列舉大量事例，《韓非子》指出「度量」與「義理」上的正確未必能說服君王，也就是說，僅僅依賴言論內容和價值觀念的直諫在現實中已經無法發揮效用。同時還認為「善謀」、「善說」、「仁賢忠良」之類個人能力及道德水平也不足以打開困境，一旦遇到悖亂闇惑之主，即使是聖賢也難逃刑辱。《韓非子》的論述，可視為戰國時代後期君臣關係高度緊張的證言。前引 David Schaberg 論文指出，中國古代早期文本中的直諫故事預設了統治者與臣僚間近乎平等的關係，而間接進諫的故事則相反，統治者有權置他的臣僚於死地，可能是戰國時代中期以後君權趨於集中的誇張反映。⁴⁹ 直諫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君臣雙方基本觀念上的一致，外加相互信任，這也是中國傳統論政語言以「雅言」為中心，即圍繞著世代相傳的經典文本展開的前提。本文認為，直諫的失效，一方面是由於 David Schaberg 指出的君臣權力失衡；另一方面也是統治層內部原本共享的傳統文化衰退的結果，如本文前章所論「雅言」與「俗文」的交錯，是這種衰退在語言層面的錯綜體現。在新的政治環境中，政治語言想必也進入了轉型的過程，一方面激發了諸子百家對此的思考與爭鳴；另一方面也讓荀子希望傳承的「雅言」面臨深刻的質疑。

眾所周知，《荀子》文本在先秦諸子中有著特別突出的論戰性格，即具有明確的批判對象。筆者認為，這種「對外」性格是理解荀子學說主張的重要因素，因此根據某個具體論題比較《荀子》與其它學派的相關論述，能起到還原當時的爭鳴語境，找到兩者異同在何處的作用，以此反推什麼才是把荀子與其他人

⁴⁸ 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卷 1，頁 52-53。又，引文從宋乾道黃八郎本作「君子不少」，但王先慎據今本改作「君子難言」，陳奇猷則讀作「君子不前」。

⁴⁹ David Schaberg, "Playing at Critique: Indirect Remonstra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Shi Identity" in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ed. Martin Ker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p.196。

區分開來的核心關切。在「說」的問題上，《韓非子》與《荀子》有共享的觀點，但在一個重要的節點上存在明顯的分歧，兩相比較，即能揭示荀子「談說之術」的特點，又能顯現〈賦篇〉的創作意義。

（一）荀子的「君子必辯」與「文學」

面對手握生殺大權的君主，進言者究竟如何才能成功？《韓非子》的主張可歸結為〈說難〉中的以下兩句：「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⁵⁰「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⁵¹在《韓非子》看來，把握君主的心理活動，發表與之相當的言論是明智之舉，其中要害又在於「名利」與「愛憎」。⁵²〈說難〉對「名利」有論稱：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
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
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⁵²

在這裡，《韓非子》考慮到了君主的表面立場與真實想法不一致的情況，提醒進言者「不可不察也」。至於愛憎，《韓非子》以衛國嬖臣彌子瑕的遭遇為例：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彌子瑕母病，人
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
忘其別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

⁵⁰ 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卷4，頁254。據《韓非子》舊注，此句意為：「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說能當。」

⁵¹ 同前註，卷4，頁261。據《韓非子》舊注，此句意為：「意無拂忤，辭無繫縻，其智辯得以極騁。」

⁵² 同前註，卷4，頁254。

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⁵³

彌子瑕的僭越行為在得寵時得到寬待甚至讚許，失寵後卻舊事重提地遭到厭惡。《韓非子》以此認為，人主的愛憎情緒也是「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的要素。

基於以上前提認識，〈說難〉中有以「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為題綱的章節，其中列舉了十多種不同情況下合適的進諫方式。⁵⁴ 不過，雖然《韓非子》指出了「難言」與「說難」的原因並提示了應對方法，有一點卻沒有明言，即如此費盡苦心的進言，其目的究竟為何。名利與愛憎隨人、隨時、隨地變化，若僅僅亦步亦趨而沒有特定目標，就是單純的阿諛邀寵，而在《韓非子》的理論中，諂媚之臣是防範的對象，因為君王需要避免臣下藉君主寵信自重，導致權力的分散。⁵⁵ 筆者認為，《韓非子》雖然關注「諫說談論」，但從根本上對言論持消極態度。在〈問辯〉中，《韓非子》如此討論「辯」的起源：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

⁵³ 同前註，卷4，頁268-269。

⁵⁴ 同前註，卷4，頁261。

⁵⁵ 可參考《韓非子·二柄》中的以下論述：「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同前註，卷2，頁130-131。

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⁵⁶

《韓非子》認為，最理想的「言」即君主的「令」，是一國中最貴者，除此以外的「言行」都是禁止的對象。作為一種自下而上的勸說，諫言在前提中包含對勸說對象的不贊同，是對君主自上而下的法令秩序的威脅。不過，《韓非子》也意識到了現實中必然出現的法外特殊情況，而其應對方式是「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即認為「言」應該「當實」。在《韓非子》看來，言論首先是消極因素，理想的政治是「無辯」的，其次則是「言實相當」。需要注意的是，《韓非子》在這裡沒有徹底否決所有的言論，而是對其中的「文學」抱有特別的敵意。先秦時期的「文學」一詞含義與今日不同，《韓非子》此處所謂「文學」，從《韓非子》肯定的「言實相當」反推之，應該是言實不相稱的巧辯之言。⁵⁷〈外儲說左上〉中關於墨子的一則故事中有論稱：「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⁵⁸導

⁵⁶ 同前註，卷 17，頁 950。

⁵⁷ 陳奇猷對《韓非子·問辯》中「辯」的註釋如下：「韓非所謂辯，乃指詭辯言，非指一般之辯論。故下文云『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堅白無厚之詞，即今所謂詭辯（Sophism）也。〈外儲說左上〉：『兒說，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亦可證韓非所謂辯者，為詭辯者。春秋以還，詭辯之氣甚熾，所以然者，皆以人主不明，『悅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而辯士可以其三寸之舌致卿相之位故也。」同前註，卷 17，頁 951。

⁵⁸ 同前註，卷 11，頁 668。

致「以文害用」的「辯說文辭之言」，在推崇實用的墨子看來無益，《韓非子》在這一點上與墨子不無相和。而《荀子》對「辯」與「文學」的看法則與他們鮮明對立：

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鐘鼓琴瑟。故君子之於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卹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⁵⁹

這段論述與「談說之術」一樣來自〈非相篇〉，荀子在其中不僅主張「君子必辯」，還認為對「文」的追求是君子的重要素養。本文認為，荀子的觀點，其實是儒家兩個固有傳統的延續。首先，《韓非子》對「無辯」的終極追求，意味著取消儒家君臣的一個重要責任——進諫與納諫。在《荀子》論述為臣之道的〈臣道篇〉中，敢於進諫的臣子被賦予了極高的地位：

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隕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子、兄弟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所厚也，而闇主惑之，以為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⁶⁰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在此將進諫分為兩類：「用則可，不用則去」的「諫」

⁵⁹ 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卷3，頁185-186。

⁶⁰ 同前註，卷9，頁572-573。

和「用則可，不用則去」的「爭」，但兩者受到了同等的肯定，是「社稷之臣」也是「國君之寶」。這樣一種對進諫的細分化，或許反映了戰國時代日趨複雜的政治現實，而面對同樣一個嚴峻的現實時，《韓非子》展現的消極的言論觀，與荀子堅持言論存在的積極態度構成了一個深刻對比。

其次，荀子對「文」的重視，源於儒家重視經典學習的傳統。先秦時代的「文學」一詞最早見於儒家，意思是有關《詩》、《禮》等經書典則的學養，相當於秦漢以後所謂的「經學」，⁶¹而荀子尤其強調「誦經」的重要性，認為對《禮》、《樂》、《詩》、《書》、《春秋》的學習，才是區分人與禽獸的真正的「學」：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⁶²

在此需要稍作補充的是，在「辯」與「文」的問題上，儒家內部也可能存在與荀子不同的意見。對於外人給自己的「好辯」評價，孟子「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⁶³的回答顯示了他不得不「辯」的無奈，換言之就是孟子對「辯」本身持保留態度，而前引《荀子》強調「君子必辯」的〈非相〉文以「腐儒之謂

⁶¹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臺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新一版），頁1。〈緒論〉：「文學一詞之解釋，每因時代而異。中外皆然。以我國而論，此詞始見論語先進篇……可見孔門文學一科，乃主修詩禮等經書典則。西漢學者仍以經典爲文學。……由此可知先秦西漢所謂文學，實乃經學。」

⁶² 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卷1，頁22-23。

⁶³ 南宋·朱熹注：《孟子集注》〈滕文公下〉，收入《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6，頁271。

也」結尾，言下之意，似乎儒者中有「好其實不卹其文」的「鄙夫」存在。《論語》中的孔子對於「巧言」屢加批評；⁶⁴《禮記》有「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⁶⁵之論，可見儒家學派中確實存在對過度辭藻的防範意識。本文認為，儒家內部存在此類分歧並不奇怪，因為這裡牽涉到究竟是「講道理」還是「美文辭」更具說服力的難題。重要的是言談的內容本身及傳遞的價值觀念是否符合正道，否則過分考究辭藻很容易淪為「盜言孔甘」⁶⁶——這樣的主張在儒家的思路中不難產生，而荀子予以反對，說明文辭對荀子自有格外的意義。此間緣由，本文認為有兩點：一是荀子及其學派身處戰國時代特別是趙、齊、楚國文化圈，深受當地「處士橫議」的影響，對談辯的重視有意無意化作了荀子思想的底色。然而，本文認為第二點更為關鍵，即對荀子而言，文辭與其思想的核心——「禮」有深厚關聯。

回顧前引「君子必辯」章，我們就會發現，其中用以比喻「言」的「金石珠玉」、「黼黻文章」、「鐘鼓琴瑟」均為儒家文獻中常見的描繪禮樂的詞彙。荀子心目中最理想的「言」，是「禮」的語言，而「禮」的學習，是從《詩》、《書》等經典的學習開始的。禮是「文飾」，帶有禮的「文飾」的語言，就是依據經典

⁶⁴ 比如〈學而〉與〈陽貨〉有「巧言令色，鮮矣仁」；〈公冶長〉有「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衛靈公〉有「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⁶⁵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禮記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第5冊，卷54，頁919。

⁶⁶ 在此補充一點，《荀子》同樣重視實質內容以及作為價值觀的「仁」對言論的意義，如在〈非相篇〉中認為：「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君子辯，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訥也。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導於下，政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君子必辯。」參見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卷3，頁192-193。又〈正名篇〉：「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不動乎眾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執，不利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參見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卷16，頁913。

的「雅言」。然而，問題就在於，在新的政治與時代環境中，荀子所提倡的傳統風格的文辭，是否能對君主產生有力的說服效果？在〈難言〉中，《韓非子》詳細列舉了多種文辭風格及其給人的印象：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1) 言順比滑澤，洋洋纔纔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2) 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掘而不倫。(3) 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4) 摠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辯。(5) 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6) 闊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7) 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8) 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9) 言而遠俗，詭譎人間，則見以為誕。(10) 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11) 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12) 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⁶⁷

(1)、(3) 是詞藻過剩導致被認為華而不實；(2)、(4) 是言辭純樸卻被認為笨拙；(5)、(6)、(7)、(8)、(9) 均涉及談論的題材風格；(10)、(11) 讓人聯想《論語·雍也》中「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⁶⁸ 之論；(12) 似乎特別針對善於引經據典的儒者。荀子對言談的觀察與《韓非子》有相同之處，如〈非相〉中「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⁶⁹，與上文中的(8)、(9) 對應。但在(12) 即對待《詩》、《書》的

⁶⁷ 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卷 1，頁 47-48。引文中數字為筆者所加。

⁶⁸ 魏·何晏集解，北宋·邢昺疏，清·阮元校勘：《論語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第 8 冊，頁 54。

⁶⁹ 唐代楊倞對《荀子·非相篇》此句作如下注釋：「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也。」參見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卷 3，頁 189。江戶儒者太田方《韓非子翼毳》曰：「言而近世，謂近

態度上，兩者出現了根本分歧。《韓非子》認為，在議論中「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即倚仗傳統會給聽眾帶來「誦」⁷⁰的負面印象。《荀子》文章頻頻援引《詩》、《書》，似乎正是《韓非子》的批判對象。雙方各持自己的立場，看似沒有交鋒，然而，如果結合本文第二章的考察，〈賦篇〉中「雅言」化了的隱語，可視作荀子用實際創作回應了《韓非子》的質疑。

〈賦篇〉中的〈知賦〉，是以「君子之知」為謎底的一首隱語：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惛惛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脩，跬以穿室。大參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而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脩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知。⁷¹

這首隱語，強調是「君子之知」使得「桀紂以亂，湯武以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這樣的內容，顯然是面向統治者的。可以想像，如果將它安置在一個具體的故事語境中，這篇〈知賦〉就是一篇臣子勸

世俗之言也。此云世，下云俗，互文也。荀子非相篇：『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僂。』參見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卷1，頁50。

⁷⁰ 所謂「誦」，根據《韓非子·難言》中「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下舊注：「誦說舊事」。參見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卷1，頁52。另，據《周禮·春官·大司樂》中「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下漢代鄭玄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參見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清·阮元校勘：《周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第3冊，卷22，頁337。

⁷¹ 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卷18，頁1012。

君主用「知」來進行統治、為國家百姓帶來太平安寧的進諫之作。從創作手法來看，它沒有機械性地「時稱《詩》、《書》，道法往古」，而是通過詩賦化了的隱語——荀子「俗文雅化」的成果——通俗又不失典雅、莊重而不顯老套地表達了自己的主張與建議。我們無法實際檢測它在當時朝堂上的說服力，但通過《史記·滑稽列傳》所載的一個故事，或可以想像荀子賦作為進諫文章時給人的印象：

優孟，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槨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柰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壙竈為槨，銅歷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72

「樂人優孟」的故事，結構與先秦隱語故事非常相似，都發生在君主拒絕諫言的危險氛圍中，而主人公出身卑微，通過帶有娛樂性、表演性的間接諫言說服了君主。他在楚莊王面前「仰天大哭」，然後給出了兩句帶有明顯賦體特徵的譬

⁷² 西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126，頁3200。

喻性諫言。「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榧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以及「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槨，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兩段，被視爲漢代諷諫賦的先聲，修辭水平遠超平均水準，似可以與荀子賦相比較。文采斐然的詩賦進諫在樂人優孟的故事裡獲得了成功，由此來看，經荀子轉化而成的「新雅言」，不會像《韓非子》所指責的那樣，僅給人以陳詞濫調的負面印象。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比起優孟，荀子賦的辭藻顯得更爲克制，但與之相對的，具有不可同日而語的思想深度。正如前文引用的幾則門客隱語一樣，優孟賦只能在楚莊王的這一個故事裡，以楚莊王爲對象時成立，反觀荀子賦的讀者卻並不一定要以特定統治者爲對象，甚至不一定要以君王爲對象。作為荀子「談說之術」理念的一個具體實踐，荀子賦的進諫對象可以是荀子能夠達到的傳播範圍之內的所有人。

總而言之，本文將《荀子·賦篇》視作荀子在文學方面實踐自身思想理念的創作結果，反映了他以合乎「《詩》、《書》雅言」也就是合「禮」的語言爲最理想、最具說服力的政治語言的思想。通過親身實踐，荀子反駁了關於經典、文辭的現實效用的質疑，用自己創造的「新雅言」傳播思想主張，積極回應了戰國時代關於「勸說」的時代命題。

（二）言順禮義：〈賦篇〉與荀子的禮治圖景

《荀子·非相篇》稱：「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⁷³《荀子》之「禮」是統籌世間萬物的最高規範，語言自然也在其中，「不順禮義」之言即為「姦言」，即使是「必辯」的君子也不會傾聽。初看之下，荀子對語言的嚴格統制彷彿《韓非子》。《荀子》對言談的觀察確實與《韓非子》

⁷³ 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卷3，頁185。

有相同之處，都認為「言而近世」和「言而遠俗」是有缺陷的。不過，與《韓非子》止於指出兩者的缺陷不同，《荀子》認為理想的言說在兩者之間，「善者於是間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羸紕，府然若渠匱、槩枯之於己也」。⁷⁴ 荀子理想中的言談隨「時」、隨「世」而變，且以發言者為行動主體，異於《韓非子》理論中出自君主一人的絕對法令。⁷⁵ 接著，荀子論述君子的言談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因此能做到「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⁷⁶ 在《韓非子》的理想中，作為君主之「言」的法令乃國中至尊，但凡與之不符者都應禁止，而《荀子》的君子則容許「罷」、「愚」、「淺」、「雜」者的存在。《韓非子》與《荀子》同樣對言談進行了規制，理想卻頗不相類，顯示出《韓非子》之「法令」與《荀子》之「禮」的區別。

本文認為，《荀子》的禮儀與語言觀應是儒家傳統的展開，如〈勸學篇〉以下段落似乎就基於《論語·季氏》中，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⁷⁷ 又：

有爭氣者，勿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

⁷⁴ 唐代楊倞為《荀子·非相篇》此文作如下注釋：「羸紕，猶言伸屈也。府，與俯同，就物之貌，或讀為附。渠匱，所以制水。君子制人亦猶此也。」同前註，卷3，頁190。

⁷⁵ 《荀子》的理想談辯具有變化的特徵，還見於〈非相篇〉中對「聖人之辯」和「士君子之辯」的如下描述：「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居錯遷徙，應變不窮，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同前註，卷3，頁193。由於主題和篇幅有限，本文對荀子所言「變化」的具體含義為何不做深入探討，但筆者認為這種「變」應該與荀子重視與時俱進的思想是有一貫性的。

⁷⁶ 同前註，卷3，頁186。

⁷⁷ 魏·何晏集解，北宋·邢昺疏，清·阮元校勘：《論語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第8冊，卷16，頁148-149。

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慎其身。《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⁷⁸

在上文中，「禮恭」、「辭順」、「色從」被認為是言語交談的前提條件，而這三者，恰好可以用來描述《荀子·賦篇》隱語問答中存在的禮儀因素。

回顧先秦隱語的記載，故事中的君主往往不得其解，處於主動地位的是開示答案的主人公，唯「一鳴驚人」的故事是一個例外，突出了君主的正面形象。相形之下，荀子的隱語雖然同樣發生在君臣之間，卻與前兩種情況都不相同。荀子的隱語中，臣子是提問者，如〈禮賦〉：「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而君主的回應則是一連串「與」、「歟」、「邪」結尾的疑問句，最後以溫和而請教的語氣提出謎底，如「請歸之禮」、「夫是之謂君子之知」。對於向自己請求答案的臣子，君主即使回答得有理有據，也發揮了謙讓而不是居高臨下的態度。一上一下，一問一答，分工明確，雙方卻都以問句作結，把主動權讓給對方，進退之間，合乎「禮恭」、「辭順」、「色從」三點。《荀子·大略篇》所謂「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鎗鎗」，⁷⁹ 蓋是如此。

再者，隱語作為民間俗文，根本上帶有娛樂性，還有競技性，而荀子對此的禮儀化，讓人想起儒家對射藝的儀式化處理。《論語·八佾》載孔子之語稱：「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⁸⁰ 射禮是儒家傳統中的一個重要古禮，《儀禮》中有詳細的相關記載，歷代以來受到重視。射藝源自戰爭，其根本帶有暴力性，儒家卻通過禮儀化的方式，將它變成了君子的教養。荀子對隱語的儀式化，或是儒家傳統作法的靈活轉用。〈大略篇〉載「坐

⁷⁸ 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卷1，頁36。

⁷⁹ 同前註，卷19，頁1054。

⁸⁰ 魏·何晏集解，北宋·邢昺疏，清·阮元校勘：《論語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第8冊，卷3，頁26。

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

⁸¹ 與之相應的記載見於《儀禮·士相見禮》：「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⁸² 禮儀除去了隱語語言原本帶有的戲謔性和競技性，是荀子「以雅化俗」的又一體現。另外，在〈大略篇〉中可以看到如下論述：

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⁸³

在天子的即位儀式上，上卿、中卿、下卿依序獻策，內容都是告誡君主之語。在這段僅見於《荀子》的孤立記載中，或能看到荀子學派將進諫定位於國家最高政治禮儀中的理想。墨子認為文辭有害於實用，荀子卻認為典雅的文辭有助於更好的語言表達；韓非子的理想是言論的驅逐，荀子卻追求進諫在制度層面的保障。〈賦篇〉中描繪的君臣隱語問答，應是荀子理想中禮儀政治的具體圖像。

四、結論

綜上所述，本文的第一個觀點是，《荀子·賦篇》中的隱語創作，是荀子嘗試匯通「雅俗」與「新舊」、延續和更新儒家「雅言」傳統的結果。身具「士」

⁸¹ 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卷 19，頁 1058。

⁸²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清·阮元校勘：《儀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 年），第 4 冊，卷 7，頁 74。

⁸³ 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卷 19，頁 1049。

與「俳」兩種身分的東方朔終歸「滑稽」，被排斥在漢帝國確立的正統「雅」文化之外。在秦漢以後秩序森然的中國，正統與末流、精英與庶民、傳統與時興之間涇渭分明，像荀子嘗試融會貫通的思想努力，似乎自此難覓蹤影，⁸⁴ 但「雅俗」、「新舊」所象徵的變動時代中的文化傳承問題，對於今日的我們而言仍有現實性。

本文第二個觀點是，《荀子·賦篇》的時代意義可通過隱語在當時的政治言說中發揮的進諫作用和荀子「談說之術」的概念來進一步理解。荀子的「談說之術」，是戰國時代君臣關係劇烈變化的背景下，諸子百家對「如何勸說權力」的思考的一個回應。在他的回應中，荀子反駁了針對儒家重視《詩》、《書》等經典的質疑，而〈賦篇〉中「雅言化」了的隱語，可以視作荀子根據自己的理想語言觀念創造「新雅言」的實踐成果，同時呈現了荀子以「禮」為核心的政治理想。

⁸⁴ 諧隱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仍有文人創作，但受到了來自正統文學立場的批判。參見龔斌：〈建安諧隱文學初探〉，《許昌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3期，頁20-24。

徵 引 書 目

一、傳統文獻

- 春秋·左丘明撰，吳·韋昭注：《國語》，臺北：中華書局，1966年。
- 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西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西漢·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校：《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西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西漢·劉向：《列女傳》，收入《穆天子傳·列女傳·高士傳》，臺北：中華書局，1972年。
-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清·阮元校勘：《周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第3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
-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清·阮元校勘：《儀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第4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
-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禮記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第5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
- 魏·何晏集解，北宋·邢昺疏，清·阮元校勘：《論語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第8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

-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正文書局，2000年。
- 南朝梁·劉勰著，黃叔琳注，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南宋·朱熹注：《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南宋·王應麟撰，清·翁元圻輯注，孫海通點校：《困學紀聞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 南宋·王應麟著，張三夕、楊毅點校：《漢制考·漢藝文志考證》，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元·祝堯：《古賦辨體》，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366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1986年。
- 明·郭子章：《六語》，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子部·雜家類》，第65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
- 清·程廷祚：《青溪集》，收入《金陵叢書》乙集之十，蔣氏慎修書屋校印，1915年。
- 清·郭慶藩撰，王孝順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清·章學誠著，王重民通解：《校讎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二、近人論著

（一）近人專著

- 朱光潛：《詩論》，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
- 朱曉海：《漢賦史略新證》，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高正：《荀子版本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梁啟雄：《荀子簡釋》，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年。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臺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 年新一版。

褚斌傑：《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

（二）單篇論文

伍振勳：〈「逝者」的意象：孟子、荀子思想中的流水、雲雨隱喻〉，《成大中文學報》第 31 期，2010 年 12 月，頁 1-26。DOI:10.29907/JRTR.201012.0001

伏俊璉：〈《漢書·藝文志》「成相雜辭」「隱書」說〉，《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5 期，頁 52-56。

周鳳五：〈由文心辨騷、詮賦、諧謔論賦的起源〉，中國古典文學會主編：《文心雕龍綜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店，1988 年，頁 391-406。

馬世年：〈《荀子·賦篇》體制新探——兼及其賦學史意義〉，《文學遺產》2009 年第 4 期，頁 23-31。

馮良方：〈荀卿賦綜論〉，《雲南教育學院學報》第 8 卷第 4 期，1992 年 8 月，頁 83-93。

戰化軍：〈先秦隱語研究〉，《淄博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7 卷第 1 期，2001 年 3 月，頁 60-65。

簡宗梧：〈賦與隱語關係之考察〉，《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8 期，2004 年 5 月，頁 33-54。

龔斌：〈建安諧隱文學初探〉，《許昌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 年第 3 期，頁 20-24。

〔德〕柯馬丁（Martin Kern）著，楊治宜譯：〈《荀子》的詩性風格〉，《邯鄲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4 期，2012 年 12 月，頁 107-119。

（三）外文論著

〔日〕小島毅：《宋学の形成と展開》，東京：創文社，1999 年。

（四）外文單篇論文

David Schaberg, “Playing at Critique: Indirect Remonstra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Shi Identity” in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ed. Martin Ker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pp. 194-225.